



国际儒学研究

【第二十二辑】

国际儒学联合会 编

单纯 于建福◎主编



九州出版社 |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JIUZHOU PRESS



国际儒学研究

【第二十二期】

总编辑 朱海濱 主编 朱海濱

执行编辑 朱海濱 副主编 朱海濱

（一）朱海濱 总编辑 朱海濱 主编 朱海濱

《国际儒学研究》第二十二辑

国际儒学联合会 编

单 纯 于建福 主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国际儒学研究. 第22辑/单纯, 于建福主编; 国际儒学联合会编. —北京: 九州出版社, 2013. 12

ISBN 978-7-5108-2568-2

I. ①国… II. ①单… ②于… ③国… III. ①儒学—文集
IV. ①B222.0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304469号

国际儒学研究. 第22辑

作 者 国际儒学联合会 编 单纯 于建福 主编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出 版 人 黄宪华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35号(100037)

发行电话 (010) 68992190/2/3/5/6

网 址 www.jiuzhoupress.com

电子信箱 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 刷 河北省三河市九洲财鑫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20毫米×1020毫米 16开

印 张 25

字 数 420千字

版 次 2014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4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8-2568-2

定 价 78.00元

《国际儒学研究》编委会

主 任：滕文生

副主任：曹凤泉

主 编：单 纯 于建福

委 员：张学智 郭 沂 单 纯 于建福

张 践 黄朴民 郭齐勇 乔清举 曹凤泉

(以上均为中国大陆)

梁承武 (韩国) 李瑞智 (澳大利亚)

安乐哲 (美国) 顾 彬 (德国)

陈荣照 (新加坡) 刘国强 (中国香港)

董金裕 (中国台湾) 土田健次郎 (日本)

目 录

会议致辞

在慕尼黑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	滕文生	3
不同文明的对话交流与互学互鉴是共同进步之道		
——在“儒学与俄罗斯文明的对话”国际学术论坛上的		
致辞	滕文生	8

儒家伦理专题研究

本体与生态：导向天人环境伦理学八原则	（美国）成中英	21
法先王、合法性与儒家王道政治伦理	俞荣根	32
整体主义环境哲学对现代性哲学的挑战	卢 风	45
Ethico—Economic Lessons of the Financial Crisis: Do Values		
Make a Country More Successful?	（德国）Christoph Luetge	76
Healing the Planet	（美国）Joseph Grange	96
Hegels Idea of Nature and Man	（德国）Michael Spieker	126
从人生境界到生态境界		
——王阳明“良知上自然的条理”论析	张学智	144
儒家天人合一自然伦理的现代转化	徐 春	157
经济应该由道德和政治来领导		
——论钱穆的经济文化观	陈泽环	168
论儒家生态伦理的思想基础及其实践	金富平	179
论对传统儒家伦理文化的把握与利用	韩东屏	191

2 《国际儒学研究》第二十二辑

儒学经济伦理思想“义”与“利”之体用	(澳大利亚) 冯文玮	197
坎陷如何开出民主?	杨泽波	208
在全球化发展的趋势下, 儒家的伦理精神对企业永续发展之 重要性	(中国台湾) 方俊吉	223
论孟子的权利与责任思想	单 纯	234
“全球伦理”何以可能?	黄玉顺	253
责任伦理: 一种新的道德思维	曹 刚	264

比较视野中的儒学

理学与宗教		
——以周敦颐、张载、邵雍为中心	张学智	281
西夏学研究平台上的中俄文化合作与交流	李 伟	294
中华“孝治天下”历史片论	舒大刚	305
托尔斯泰与儒学	颜炳罡	319
儒家的礼与东正教的礼拜	张百春	331
中国儒家生态文明思想的人类意义	乔清举	339

书评

略论佐藤一斋的《论语栏外书》	(日本) 小幡敏行	357
----------------------	-----------	-----

会议综述

中西文化交汇中的环境伦理、政治伦理和经济伦理		
——儒学与全球伦理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卢 风	367
“2013 中国儒学与俄罗斯文明对话”国际学术论坛综述	李焕梅	373
促进文化会通 与亚洲同飞		
——“2013 年中澳文化对话”国际论坛综述	田辰山 温海明	378

会议致辞

在慕尼黑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

(2012 年 7 月 17 日)

国际儒学联合会常务副会长 滕文生

尊敬的克劳迪亚·贝克曼教授

尊敬的迈克尔·斯比克博士

尊敬的杜伦博士

尊敬的各位学者朋友：

今天，我们在这里进行“中国儒学和德国哲学的对话”，研讨“理性和道德的基础”问题，与会朋友都是在各自研究领域卓有成就的专家，可谓群贤毕至、幸会一堂。请允许我代表国际儒学联合会和叶选平会长，对积极促成此次会议并为其顺利召开不辞辛劳竭诚奉献的贝克曼教授、斯比克博士、杜伦博士和德国公民教育学院，致以诚挚的谢意！对参加会议的各国学者朋友，表示热忱的欢迎！并预祝研讨会圆满成功！

中国和德国，分属亚欧两洲。地理的距离、国情的差异，并不能妨碍中德、中欧之间的思想文化交流和相互学习。而这种相互交流和学习源远流长，对各自的发展可以收到取长补短、相得益彰之效。

从欧洲中世纪晚期以来，以儒学为主干的中国文明，就已通过来华的欧洲人和到欧洲留学的中国人，传入欧洲各国。意大利的耶稣会士利玛窦，是最早把中国历史文化介绍到欧洲的文化名人之一。他在中国生活了 28 年。1594 年，利玛窦将儒学的经典著作“四书”即《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翻译成拉丁文在欧洲传播，他认为孔子的儒家思想同基督教的教义如出一辙。在这之后的 1626 年，法国耶稣会士金尼阁又将“五经”即《诗经》、《尚书》、《周易》、《礼记》、《春秋》，译成拉丁文在欧洲传播。来华传教

的耶稣会士们对中国儒学和其他历史文化典籍的介绍与提倡，在欧洲的思想文化界产生了很大影响。从16世纪末到18世纪将近二百年间，整个欧洲出现了“中国文化热”。一大批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俄罗斯等欧洲的著名学者，十分关注并不断研究中国的哲学、文学、历史和经济、政治、军事，发表了许多解读和推崇中国文明的远见卓识。

法国的启蒙思想家们，是最先研究中国儒学和中国历史文化并深受其影响的一批学者。1713年，孟德斯鸠曾同在法国皇家文库工作的中国福建人黄加略进行过长谈。他的《论法的精神》等著作，就受到儒学特别是宋明理学的影响。伏尔泰认为儒学的哲学思想没有迷信和谬说，没有曲解自然，是最合人类理性的哲学。狄德罗认为中国哲学的基本概念是“理性”，孔子的学说是以道德、理性治天下。霍尔巴赫认为“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的把政治和伦理道德相结合的国家”。以上这些学者都是法国百科全书派的领军人物。法国“重农学派”的创始人魁奈，也认为中国文明是欧洲政治经济应该学习的主臬，他的重农主义思想就受到儒学“以农立国”的“自然之理”思想的影响。担任过法国财政部长的重农学派改革家杜尔哥，还提出过法国的发展需要借助中国文明的经验。

当中国的历史文化传播到德国时，学者们的研究也是盛况空前。当时德国的不少学者不仅可以阅读到拉丁文本的中国先秦儒学典籍，而且可以阅读佛兰恺用德文翻译的董仲舒的《春秋繁露》。德国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如莱布尼茨、康德、费尔巴哈、歌德、席勒等等，都对中国历史文化进行过研究并发表了许多精辟的见解。莱布尼茨是欧洲第一位肯定中国文明对于欧洲文明十分有用的思想巨匠。在他倡导建立的柏林、维也纳、彼得堡的科学院中，探讨中国哲学与文化被列为重要的研究项目。他在1715年写的《论中国哲学》的长信中，表达了对中国先哲们的思想开放、独立思考、富于思辨、崇尚理性的尊崇和向往。他主张欧洲应该学习吸收中国的政治、伦理文化，中国则应该学习吸收欧洲的理论科学。莱布尼茨从《周易》中得到灵感而撰写的二进制学说，为德国哲学增加了辩证的思想因素。康德从儒家的哲学思想中受到启发而创建的用辩证的、联系的、发展的观点考察自然界的科学方法，开了德国古典哲学区别于英国经验主义和法国理性主义的先河。费尔巴哈认为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思想，是“健全的、纯朴的、正直的道德体现”，是一种高尚的哲

学伦理。被誉为德国文学史上最耀眼的“双子星座”的歌德与席勒，对中国文学怀有浓厚的兴趣，他们曾创作过《中德四季朝暮吟》、《图兰朵》等关于中国的文学作品。

是不是可以这样说，中国儒家和道家、法家等诸子百家学说中的哲学伦理、政治思想、人文精神的精华，中国历史上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的精华，为欧洲的思想家、政治家所吸取和借鉴，对于冲破欧洲中世纪神学政治的禁锢，对于欧洲启蒙运动的兴起和欧洲近现代文明的发展，曾经提供过思想养料和政治动力，提供过四大发明为代表的物质技术条件，从而对欧洲文明的进步起到了积极的影响和作用。每忆及此，我们为中国文明能够对欧洲文明和世界文明作出重要贡献而感到光荣。

毫无疑义，思想文化的交流、传播及其影响，从来都是相互的。中国从欧洲的思想文化和经济、科学技术中，也学习、吸收、借鉴过不少进步思想、发展经验和先进技术。欧洲文明的精华，对中国文明的发展也起到过积极的影响和作用。对此中国人民是记忆犹新的。

就在利玛窦来华传教期间，中国明代的不少学者和官员，就向他学习过欧洲的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知识。其中最有名的是徐光启、李之藻。徐光启当过明朝礼部尚书，同时是一位杰出的农学家、科学家。1600年，他结识了利玛窦，抱着“一物不知、儒者之耻”的虚心态度向利玛窦请教西方科学。他同利玛窦合译了欧几里得的数学名著《几何原本》，并根据利玛窦的讲授撰写了介绍欧洲水利科学的著作《泰西水法》，还吸收欧洲的天文历法知识制定了《崇祯历书》。徐光启是明代末年中国学者中学习西方科学文化的领袖群伦的人物，是中西文化交流的先驱之一。李之藻精通天文、数学，也是明代杰出的科学家。他曾同利玛窦合作撰写和编译了《浑盖通宪图说》、《同文算指》等介绍欧洲天文、数学等自然科学知识的著作，同葡萄牙人傅汎际合译了亚里士多德的名著《论天》和《辩证法概论》。这些欧洲的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知识在中国的传播，对于中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所起的促进作用是功不可没的。

近代以来，欧洲的各种思潮更是纷纷传到中国。欧洲各国的许多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重要典籍，从哲学、历史、文学、艺术到经济、政治、法律、科技，先后在中国翻译出版发行。这些读物，其涉及领域之广、数量之多，可以用中国的一句成语来形容，叫做“山阴道上，应接不暇”。

就德国而言，我想举出在文学艺术和哲学方面的几位大家及其作品给中国人民留下的深刻印象与认识。歌德的《浮士德》、《少年维特之烦恼》，席勒的《阴谋与爱情》、《欢乐颂》，在中国文化界几乎是耳熟能详。王国维、梁启超、鲁迅、郭沫若等中国文化名家，对这些作品都曾给予高度评价。康德、费尔巴哈、黑格尔可以说是中国人了解最多也是对中国近现代哲学产生过重要影响的德国哲学家。在20世纪初，随着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在中国广泛传播，作为其先驱思想来源之一的费尔巴哈、黑格尔的哲学思想在中国也传播开来。中国的伟大领导者毛泽东先生在与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交谈中，在谈到研究和学习德国哲学时曾经这样说过：我青年时曾信过康德的哲学，也看过费尔巴哈、黑格尔的一些哲学著作。德国的进化论者海克尔的书也有“相当丰富的材料”，他“实际上是唯物主义者”。毛泽东先生的重要哲学著作《实践论》、《矛盾论》，显然也是吸收了费尔巴哈、黑格尔的哲学思想中关于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的合理内核。马克思、恩格斯无疑是对中国现代文明的进步和现代历史的发展影响最大的德国人。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马克思、恩格斯不仅是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经济学家，而且是为中国的革命和建设提供了科学指导思想的理论导师。1898年一个叫胡贻谷的中国学者翻译了英国人所著的《社会主义史》，从这本书中，中国人最早知道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名字及马克思主义学说。其后，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李大钊、陈独秀、李达等人，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主要传播者。马克思主义学说一旦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包括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就给近代以来积贫积弱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中国经过28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终于成功地走上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

历史发展到现在，世界已进入经济全球化时代，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各国的经济文化社会联系日益紧密，人类文明无论在物质还是精神方面都取得了巨大进步。但是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新自由主义的盛行，也带来了许多问题和弊端。诸如无限度地追逐高额利润、无休止地争夺和滥用资源、无节制地追求高消费的生活方式，以及脱离实体经济追逐金融投机等等，由此造成资源破坏、环境污染和各种冲突不断，造成国家之间、地区之间、社会成员之间的贫富悬殊，造成物质至上而精神道德沦丧的现象，造成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这些问题，是国际社会亟待解决的紧迫问题。解决这些问题的出路和办法在哪里，可以借鉴的历史经验和历史智慧在哪

里？各国的政治家、有识之士和专家学者，都在思考和探索。要解决这些问题，当前最重要的是世界各国要加强平等协商，各种不同文明要加强对对话和交流，要充分吸取不同国家、不同文明的思想文化精华。不论是经济还是社会的发展，都应实现同合理利用资源和保护环境相协调的可持续发展；不论是国家之间还是地区之间，都应消除政治军事冲突而实现持久和平；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应实现互利互惠和共同繁荣。这是全世界人民所希望达到的目的。

在解决上述问题的过程中，儒学文化是可以而且能够发挥重要作用的。世界上一些有识之士已认识到了这一点。1988年，诺贝尔获奖者在巴黎举行主题为“面向21世纪”的集会。在会议的新闻发布会上，瑞典的汉内斯·阿尔文博士就指出：人类要生存下去，就必须去吸取孔子和儒家学说的智慧。美国著名学者约翰·奈斯比特在其著作《亚洲大趋势》中也指出：要重新重视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借以抵御日下的世风，防止职业道德破坏、享乐式消费、个人主义膨胀以及政治狂热。他们的这些看法，可以说在相当不少国家的政要和专家学者中已成为共识。

儒学作为一种具有世界影响的思想文化遗产，蕴含着丰富的思想财富。这些思想财富，无论是对解决当今国家与社会治理和经济文化发展中的问题，还是对处理当今国家与国家关系、各种经济社会关系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等方面的问题，仍然具有自己的价值。比如，儒学中包含着关于安民、惠民、保民、“以民为本”的思想，关于敬德、明德、奉德、“惟德是辅”的思想，关于中和、泰和、和谐、“和而不同”的思想，关于仁者爱人、以己度人、以德为邻、“协和万邦”的思想，关于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俭约自守、“天人合一”思想，关于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乱、“居安思危”的思想，等等。从这些思想中，是可以找到解决经济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带来的问题和弊端所需要的某些智慧、经验与历史借鉴的。我们国际儒学联合会的同仁们，愿意同各国的思想家、政治家和专家学者们一道，共同为此作出努力。我们这次举行“中国儒学和德国哲学的对话”，研讨“理性和道德的基础”问题，也是为发掘和发挥儒学的思想价值，为促进世界和平和各国共同发展服务而进行的一次有益尝试。

最后，祝中德两国人民和学者的友谊之树长青！

谢谢大家！

不同文明的对话交流与互学互鉴是共同进步之道

——在“儒学与俄罗斯文明的对话”国际学术论坛上的发言

(2013年6月26日)

国际儒学联合会常务副会长 滕文生

尊敬的季塔连科院士

尊敬的李辉大使

尊敬的各位专家学者：

在莫斯科气候宜人的时节，我们在这里会聚一堂，举行“儒学与俄罗斯文明的对话”国际学术研讨会，这是国际文化和文明交流中的一件盛事。请允许我代表国际儒学联合会和叶选平会长，向承办这次会议的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和积极促成此次会议的季塔连科院士、卢基扬诺夫教授致以诚挚感谢！向与会的俄罗斯和中国的学者朋友们表示热忱欢迎！并预祝研讨会取得成功！

中俄两国都是历史悠久并在世界上具有重要影响的伟大国家，也是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我们两国很早就有了文明的接触，通过中国陆上的古丝绸之路，穿越中亚地区，沿着伏尔加河直达俄罗斯一些重镇，两国的经济文化联系从远古时代就开始了，在千百年来源源不断的相互交往中，留下了许多珍贵记载和友谊佳话。

从16世纪末以利玛窦为代表的欧洲来华传教的耶稣会士，将中国儒学为主干的历史文化典籍传播到欧洲开始，到英国工业革命和法国大革命时止，在欧洲兴起并延续了200年的“中国文化热”，对包括俄罗斯在内的欧洲国家近代文明的进步，产生过重要影响。有的学者认为，这实际上是欧洲继地理大发现之后的“文化大发现”。美国亚洲研究会主席雅格布森这样说过：“人们很难想象还有什么影响比中国对17、18世纪欧洲的冲击更

大、方面更多。”

当时欧洲一批著名学者，成了中国儒家和其他诸子百家思想的热心研究者与传播者。其中有德国的莱布尼茨、沃尔夫、歌德，法国的培尔、伏尔泰、魁奈、狄德罗、霍尔巴赫，英国的坦普尔等，他们大都是17、18世纪欧洲的启蒙思想家和启蒙运动的中坚力量。他们赞颂儒学为代表的中国历史文化，有的对孔子及其思想几乎到了崇拜的地步。伏尔泰就把孔子的画像挂在礼拜堂中；由于颂扬孔子，魁奈获得了“欧洲的孔夫子”称号、歌德被称为“魏玛的孔夫子”。

17世纪以后，在俄罗斯的思想文化界，也涌现出了不少热心研究与传播中国儒学及其他历史文化的学者，许多中国文化典籍被先后介绍到了俄罗斯。在中国清朝康熙年间，俄国曾派遣留学生到中国学习，学习内容之一便是儒家典籍；1715年到1860年间，俄国曾先后派出了13批传教士到中国，进行传教活动，并研究中国历史文化。在这些留学生和教士中出现了一些著名的汉学家，他们对儒学传入俄国起了重要作用。汉学家梁捷夫翻译了《大学》于1780年出版；另一位汉学家阿加封诺夫翻译了《中庸》于1788年出版；还有一些汉学家翻译了《易经》、《孙子》、《名贤集》等中国文化典籍。在18世纪俄罗斯发表的有关中国题材的作品就有120种之多。19世纪更是俄罗斯学者介绍和研究中国历史文化结出累累硕果的一个世纪，其所介绍的中国文化典籍涉及哲学、宗教、历史、地理、文学、教育、医学、美术、建筑等各个领域。特别是对儒学的研究，达到了一个高峰。东正教派驻北京的传教团修士比丘林、瓦西里耶夫成为汉学家中出色的代表。比丘林在北京居住14年，对中国哲学、历史、文学、社会都有深入研究，并把中国的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译成俄文，被称为俄国汉学的鼻祖；瓦西里耶夫所著的《东方的儒释道》、《中国文学史纲》，在世界汉学研究史上可谓建树非凡。这里，我们更应追忆起为中国人民所熟知的俄罗斯文豪普希金和托尔斯泰。普希金十分景仰中国的历史文化，他遍读了俄文、法文、德文版的关于中国文化的典籍，而且多次与比丘林交谈以更深入地了解中国文化，他还为《三字经》在俄国的传播发挥了推动作用。托尔斯泰阅读和研究了中国儒家及其他诸子的许多著作，从中吸取智慧和精神力量。他在日记和给挚友切尔特科夫的信中曾这样写道：“我在读儒家著作。难以想象，它们达到了不同寻常的精神高

度”；“我沉湎在中国的智慧之中”；“孔子的中庸之道妙极了”；“没有孔子和老子，《福音书》就不全了”。普希金、托尔斯泰等 19 世纪俄罗斯文明的杰出代表，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热爱、研究与宣传，不仅给俄罗斯人民也给中国人民留下了深刻印象。托尔斯泰晚年在给一位中国学者的信中，还深情地提出过这样的希望：“在人类生活正发生着伟大的转变中，中国应该在领导东方民族方面发挥伟大的作用。”

17、18 世纪，欧洲正处在从封建的中世纪向近代资本主义文明转变的历史进程中，社会思想界正在兴起倡导道德伦理、反对残暴政治，主张自然理性、抨击神学迷信的启蒙运动。当此之际，中国的儒学和其他历史文化典籍，一经耶稣会士们介绍到欧洲并迅速传播开来，就成为启蒙思想家们手中锐利的思想武器，从而对欧洲近代文明的发展留下了深刻的影响。这些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启蒙思想家用儒家的道德思想来批判教会和封建主的残暴统治。伏尔泰和坦普尔认为：孔子和儒家的道德规范“指导着从统治者到平民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都是自治、治家、治国之道，尤其是治国之道”。莱布尼茨在《风俗论》一书中说：儒家的道德思想，“批判了我们基督教的道德观念”，欧洲的君主们面对中国的榜样，应当“赞叹，然而更主要的是要去仿效”。霍尔巴赫认为：“国家的繁荣必须依靠道德”，欧洲应该像中国那样把政治与道德结合起来。由此可见，儒家的道德学说成为欧洲启蒙思想家反对思想政治专制的重要武器。

二是启蒙思想家倡导儒家的理性思想，反对教会崇拜超自然力量的神秘和迷信，促进了欧洲唯物主义和无神论思想的发展。法国启蒙运动的先驱培尔认为：儒家的理性主义与基督教的神秘主义是对立的，而神秘的东西是荒谬的，奉行无神论的国家同样可以创造出繁荣昌盛的文化。狄德罗、伏尔泰、魁奈都很赞赏孔子不讲超自然的奇迹，不讲“怪力乱神”，而是重视和提倡“天理天则”，即自然法则与理性，认为这比基督教的神学高明多了。

总之，当中国儒学和其他历史文化思想传播到欧洲后，尽管有一些学者如孟德斯鸠、卢梭、康德、黑格尔等并不赞同，但以百科全书派为代表的启蒙学者则是抱着学习和借鉴的积极态度，甚至根据他们当时的思想政治需要加以美化和理想化。他们之所以这么做，就是因为儒家思想中具有